累土创新亭：《方志物产》文献整理的路径与探索*

左　亮[1] 黄思慧[2] 白振田[1] 包　平[1]

（1.南京农业大学 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2.东南大学 图书馆，南京 210095）

摘　要 [目的/意义] 1958 年手抄成卷（册）的《方志物产》文献作为典籍中的类书，系统辑录了地方志中的物产篇目和相关内容，具有极高的自然、经济和文化价值。受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其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可避免地存有诸多瑕疵，亟需进行整理和校对，以便形成信史。[方法/过程]以《方志物产》文献为例，在现代信息技术的辅助下，运用文献整理中比勘校对等若干方法，从目录、版本以及内容三个方面入手，深入开展《方志物产》文献的整理实践。[结果/结论]通过整理实践，探索构建了一套《方志物产》复原还真的可行方案，为进一步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关键词　方志物产　史料整理　校雠学

中图分类号：G255.1

在中华民族传世典籍当中，地方志作为记录历史的一种独特书体，受到历代先贤的广泛重视[1]，与家谱和国史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体系[2]。“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所以可贵也[3]”。方志所记载的内容既超越了家谱的局限，又丰富了国史记载的不足，起到构建一地文化传统之功效。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旧志九千余种、十万余卷，约占我国存世古籍的十分之一。其中既有全国性的总志，如《元和郡县图志》、《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等，又有记述一地的府州县志，如《苏州府志》、《武功县志》、《祁门县乡土地理志稿本》等。“方志”名称最早见于《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指的是方国情况的记述。宋以后这一名称固定为地方文献的专用名词之一。“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物产”[4]。方志物产是指中国古代方志类著作中记载的物产信息，主要由植物、动物、矿物及货物等部分构成。物产资料一方面承担了历史史料的功能，反映地方农事活动和属地自然风土；另一方面还是长期记录物产博物性和知识性的重要载体，承担了赓续文明密码的功能。本文从手抄本《方志物产》出发，挖掘方志物产在新时代下蕴含的多重价值。并利用经典文献整理的若干方法，同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探索历史文献整理利用的有效路径。

1 《方志物产》文献概况

1.1 《方志物产》文献形成背景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方志物产知识库构建及深度利用研究”（编号：18ZDA327），2021 年度三亚南京农业大学研究院调研项目“海南地区物产资源调查研究”（编号：NAUSY-DY04）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左亮，1989 年生，安徽舒城人，南京农业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人文，科技史信息组织；黄思慧，女，1985 年生，江苏南京人，东南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情报分析；白振田，1971 年生，南京农业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网络信息智能处理；包平，1964 年生，江苏东台人，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数字人文、数字图书馆、信息组织， E-mail：baoping@njau.edu.cn.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国外学者开始对中国古代农业成就以及农业文献的重视，唤醒了中国学者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万国鼎先生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5]。1929 年在其撰写的《整理古农书》一文中强调 “关于片段的农学记载，各省府县志中可以寻到不少，因此我们对于各省府县志的搜集，也不遗余力[6]”。因此自 1955 年 7 月万国鼎先生任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开始，便开展了对地方志中农业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1955 年到 1963 年八年间，万国鼎先生以朱士嘉先生所著《中国地方志综录》①为查抄方志农业资料的基本线索，并根据南京图书馆所存方志目录以及实际调研所得方志目录进行比对，建立了集大成的《全国方志总目》②。根据这份目录，万国鼎先生组织 100 多人次，赴全国 40 个大中城市中的 100 多个文史单位，查抄了自唐贞观十六年(642)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全国所有行政区域地方志中的物产和农业资料，且于 1961 年至 1963 年派研究人员开展校对及补遗工作。随后分三大类纂辑成卷（册）③，分别为《方志物产》、《方志分类》与《方志综合》（数量如表 1 所示），本文以《方志物产》文献的整理为例。

表 1 来源志书种数、卷（册）及规模

史料名称	来源志书数量	册数	页数	字数
方志物产	6170 种	431 册	156,659 页	23,225,659 字
方志物产补遗	263 种	15 册	1,640 页	6,261,687 字
方志综合	953 种	120 册	51,931 页	9,157,386 字
方志分类	146 种	120 册	60,154 页	6,557,745 字

1.2 《方志物产》文献查抄来源

《方志物产》文献共有 446 册（其中补遗 15 册）, 158,299 页，共 29,487,346 字，查抄自全国 6170 种方志，其中地方性志书 6149 种（按照现行行政区划计算），全国性志书如《一统志》等共计 21 种。查抄志书来源地区以及查抄志书数量如表 2 所示。

表 2 《方志物产》查抄志书来源地区及数量

地区	数量	地区	数量	地区	数量	地区	数量
河北	479	山西	314	甘肃	136	海南	40
浙江	430	陕西	312	辽宁	115	北京	32
四川	415	湖南	302	重庆	100	台湾	28
江西	412	安徽	284	贵州	88	青海	25
山东	408	湖北	248	上海	76	内蒙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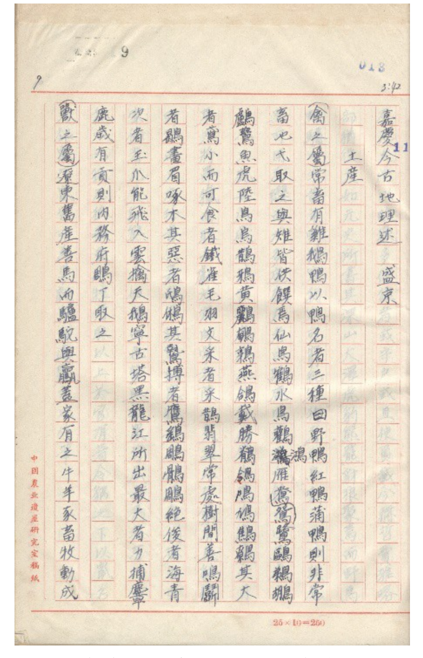
① 该书于 1935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初时收书 5832 种。新中国成立后，朱士嘉先生对该书加以补充，形成修订稿，共计著录方志 7413 种。

② 目前没有发现《全国方志总目》的下落。

③ 其中《方志分类》主要查抄自山川、风俗、水利等项，《方志综合》主要记载一地饮食、风俗、服饰、用器等。考虑到其记载体例和内容与《方志物产》差别较大，因此暂未开展整理工作。

河南	395	云南	233	吉林	66	天津	21
广东	337	福建	230	西藏	51	宁夏	17
江苏	319	广西	164	黑龙江	43	新疆	5

《方志物产》文献查抄志书类型来源广泛，除一统志、府志、通志、州志、县志、乡土志之外，对疆域志、游记、采访册、风土志、里坊志以及调查资料表中的物产资料都会进行查抄整理。只要是当时能够搜集到的地方志，均力求一网打尽，查抄志书年代能够上溯到唐宋时期。查抄篇目来自于志书中的“土产”、“物产”、“物华”、“农业”、“食货”、“农产”、“生物”等篇目。查抄内容涉及当地的物产种类、经贸情况、品种名称、引进与推广等大致情况（如图一、二所示）。


嘉慶今古地理述 盛京
土產
禽之屬 常畜有雞鵝鴨以鴨名者三種曰野鴨紅鴨蒲鴨則非常
畜也弋取之與雉皆伏[illegible]
[illegible]
鹿歲有貢則內務府鵰丁取之
獸之屬 遼東舊產善馬而驢騾與[illegible]蓋家有之牛羊豕畜牧動成

图一 嘉庆十一年（1806）今古地里述


民國滿洲三省誌 奉天省 特產 植物
(1)人參 人參產於長白山森林之中。長白山周圍千餘里。
如東邊道之長白、撫松、安圖三縣。完全包繞於其麓。然其產殖之
法亦不同。略分六等。茲為表列如下。復一一說明之。
第一等 第二等 第三等 第四等 第五等 第六等
野山參 野種參 野參移山參 家參移山參 池子底 家參
(甲)野山參 俗呼大山參。係天然植物。為珍貴之品。生於深山密
林中。以五披葉（參苗分五莖）及六披葉（參苗六莖）者為
最佳。蓋參苗上至分成五枝或六枝。其參必偉大可知。(乙)家參
一名園子參。係因人工種植以成者。其種植之法。係於長白山

图二 民国十三年（1924）满洲三省志

1.3 《方志物产》文献内容价值特点

《方志物产》文献依循了农学的基本概念与体系，收录了方志中关于物产的所有的农学知识，其中的专门的物产内容为其核心。它既是博物之书，也可为实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和指导。内容主要包含了物产名称以及物产的描述信息两部分，其中物产的描述信息中，会记述物产的别名、品种、性状、功效、产地、数量、习性、开发利用情况、种植技术、对外贸易、引用其他文献典籍名称、涉及的历史人物以及物产考证等内容，如南宋《景定建康志》记载鹿梨：“《本草》云江宁府出一种小梨，名鹿梨。叶如茶，根如小姆指，彼处人取其皮治疮癣及疥癞，云甚效，八月采”。《方志物产》的内容价值特点极具多样性：

一是具有地域性的特点，为一地特产利用以及物产文化挖掘提供历史证据。方志具有“越境不书”“全国通典不录”的地域性特点，将特定区域内的地理形胜、风俗物产等作为筑基之本，以“独立之作”体现“一方之情”。地方志中的物产篇目对物产的记载同样强调属地原则，只对本地地域范围的植物、动物、矿物及货物进行记载，强调与它地物产的差异化，体现了一定的“方土观”和“地域意识”，突出了在地特征，是不可多得的地

方性史料。在《方志物产》文献中既有当地的优质农产品历史渊源、传统优质品种以及土贡的记载，又有关于当地独特文化的记载，记载了一地如何利用物产“物、事、礼、人”的综合体特性[7]，在人情事理与物“情”物“理”之间构建起同构关系，建构出富有一地特征的审美方式和文化精神[8]。在土贡物产记载方面，如民国四年《江苏通志方物考（稿）》（上）中所载：“箭子稻，粒长而细，色白味甘，香稻之上品，九月熟。案《吴郡图经》续记稻，惟号箭子者为最，岁贡京师”。在物产民俗文化方面，如槟榔作为海南地区特色物产，其在海南当地的婚嫁风俗上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明正德六年（1511）《琼台志》中记载当地人民“俗重此物，凡交接以为先容，婚姻以为定礼。”

二是具有知识性的特点，反映了古人自然利用方式以及传统的博物学观念。传统的农业生产规律，要求乡民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时不违农时、耕耘树艺。人类利用自然中的土壤、动物、植物、气候及水利条件取得生活来源的一系列活动，先适应自然，又不受制于自然，而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积极的改造自然[9]，在此过程中不断的把握规律做出趋利避害的利用。反映到物产记载中，就是“寓观点于资料之中”，以“述而不作”为原则，将一地物产进行命名、描述、分类以及展示。以分类而言，将物产类型分为植物、动物、矿物及货物等类。在其下根据不同物产类型继续进行细分，在植物中又细分为谷之属、菜之属、花之属、果之属、杂植之属、草之属、竹之属、木之属等，动物中又细分为畜之属、禽之属、兽之属、虫之属、鱼之属等。在属之下继续细分，如在药之属之下又分为果部、草部、木部等，货物下又分为布帛、饮馔、器用等。这样复合的知识体系体现了古人“称名辨物”的传统博物观念，一方面展现了古人观察物产、表现物产、利用物产、理解物产的特点，另一方面在其中又积累了丰富的博物知识。如此系统性、客观性的知识传统，不仅仅代表了古人的知识体系，更是古人理解自然的基本方式，在其中镕铄“天道”“人事”与“物象”的直面自身生存世界的理解方式、人生实践和情感体验[10]。

三是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可以窥见一地物产消长演变、融合竞争的复杂态势。就方志物产而言，几千年相沿不辍的修志传统和物产记录，以连续性的特点对一地物产渊源起到了重要维系作用。“志中所载物产，充贡赋者，微物必详。经见闻者，所知皆记。考古证今，删繁摘要，物增于前，文减于旧。[11]”正是这样的增补删削、延续叠加为当地的物产提供了跨时代的文本呈现。并且在物产记载的延续中，对于物产“举旧志所不收，或收而失实，或讹而相冒，或混而无别，或析而无当，悉厘正之。上下千余年，条列如指掌。[12]”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修正物产记载弊病和偏差，使得物产知识的记载不断趋于客观、准确，呈现出更加合理的高品质物产历史形态。我们通过《方志物产》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可以窥见古代“地区人口的增减、物产的丰歉, 动植物和水族生长、迁徙、灭绝的情况和规律[13]”。如文焕然先生利用方志物产史料，揭示了历史时期鹦鹉的产地受到森林覆盖率变化以及人为原因而发生了迁移[14]。竺可桢先生运用方志记载以及其他观测数据，论述了五千年来中国东部气候的周期性冷暖变化[15]。

2 《方志物产》文献的现状

2.1 历史回顾

《方志物产》文献的历史整理主要集中于两个时间段：

1957 年-2000 年。1956 年开始万国鼎先生便开始着手分批整理搜集到的《方志物产》文献，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学者们默默耕耘，利用《方志物产》文献整理形成了一大批学术成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1957 年至 2000 年《方志物产》文献整理成果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代
中国农业遗产选集·上编·棉	陈祖椝	中华书局	1957
中国农业遗产选集·上编·豆类	李长年	中华书局	1957
中国农业遗产选集·上编·稻	陈祖椝	中华书局	1958
中国农业遗产选集·上编·麦类	胡锡文	中华书局	1958
中国农业遗产选集·上编·柑橘	叶静渊	中华书局	1958
中国农业遗产选集·上编·粮食作物	胡锡文	农业出版社	1959
中国农业遗产选集·上编·油料作物	李长年	农业出版社	1960
中国农业遗产选集·上编·麻类作物	李长年	农业出版社	1962
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	陈祖椝、朱自振	农业出版社	1981
中国农业遗产选集·上编·常绿果树	叶静渊	农业出版社	1991
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	朱自振	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1
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下编·稻	王达、吴崇仪、李成斌	农业出版社	1993

2000 年-至今。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普及，在《方志物产》文献的整理上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王思明及惠富平教授团队利用图像扫描、OCR 以及人工录入等形式实现了《方志物产》文献的数字化整理。二是侯汉清教授团队利用信息化技术开始对《方志物产》文献的别名、引书以及索引开展整理研究。三是包平教授团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方志物产》文献进行格式化和知识化整理，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素材库、语料库以及知识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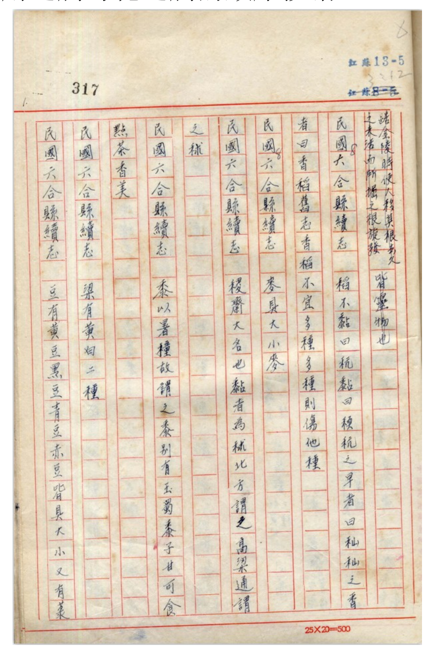
2.2 问题与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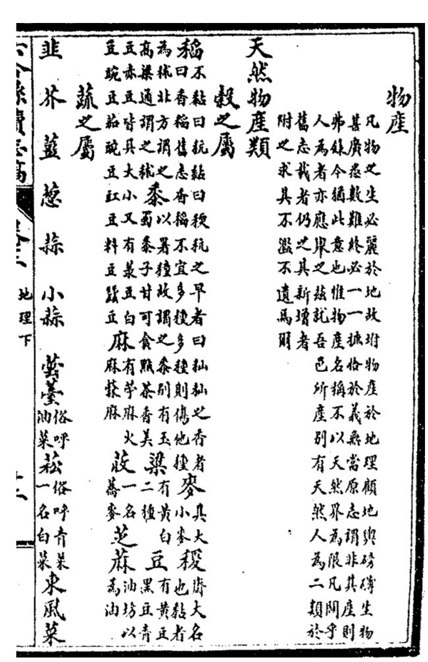
依托于《方志物产》文献的整理成果，学者们展开了丰富而立体的研究，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为《方志物产》文献的深度利用擘画了研究蓝图。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显露出《方志物产》文献存在部分基础性问题的一面。

一是对于《方志物产》文献来源方志目录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方志物产》文献志书来源目录《全国方志总目》由于某些历史原因遗失于动荡年代，后人在利用时对来源志书目录也并未加以特别重视，导致在不同学者统计的目录数据纷繁多样，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口径。

二是《方志物产》文献查抄方志仍然有所遗漏。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对于偏远地区以及县级行政单位以下的志书查抄还存在遗漏，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志书流落于海外。偏远地区以西藏为例，如道光（年代不详）《拉萨厅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抄雍正本《藏继概》等 27 种志书中的物产内容便没有收录。县以下行政区域以上海市辖区为例，如清光绪十四年（1888）《月浦志》等 18 种志书中物产内容亦没有收录。

三是《方志物产》文献在不同阶段出现了内容上的讹误。受囿于彼时查抄人员的学识、素养以及查抄难度，在查抄过程中难免出现脱文、倒文、衍文以及错乱等现象。随后的数字化转录过程中，后人并没有比对原版志书进行点校，转录时也出现了上述问题。如脱文情况，民国八年（1919）《六合县续志》在查抄过程中，遗失了物产序言以及物产分类信息（如图三所示）。在又如错乱情况，在清乾隆十五年（1750）《镇江府志》中，抄录时便将器用之属与花之属的顺序抄错。





图三 民国八年（1919）《六合县续志》查抄本与影印本对比

四是《方志物产》文献在数字化转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集外字。《方志物产》文献的查抄和转录均需要人工参与，只要是由人工参与，或多或少会因为誊抄者或者转录者的自身主观原因，对原文当中的字形出现误判、误抄、误录情况。并且从古代语言转换为计算机可以识别的语言，由于字库等诸多客观因素，会导致无法转录的情况，这些讹误和无法转录的情况汇总起来便导致了集外字的出现[16]。如误读情况，民国四年(1919)《江苏通志方物考（稿）》（上）中记载“洋小麦，即《授时通考》六棱麦”，但是在录入时，将“考”录入为“老”。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忽视文献基础，“用数据说话”并不一定能等同于数据即是客观事实，诚然有大量数据的存在，但不一定代表其中有用的信息就多。“垃圾进垃圾出（Garbage in,Garbage out）”，如果在这些数据当中掺杂着大量的错误数据或者含偏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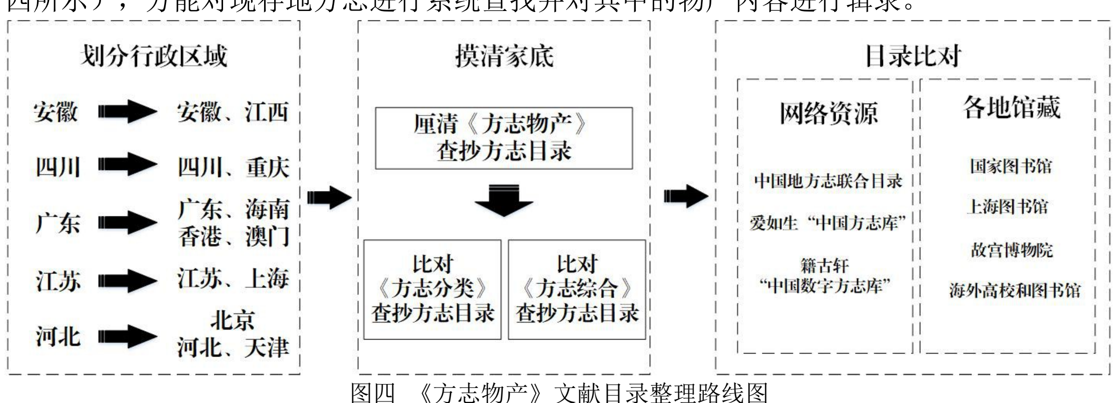
数据，或者借助上述数据进行检索进行资料堆砌，以此进行理论和结果的归纳演绎，往往会引起语义整体性的忽视与破坏[17]，并且得到的成果往往无法经受文献实证的检验[18]。因此基于《方志物产》文献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

3 《方志物产》文献整理述略

南京农业大学作为《方志物产》文献的保管处所，始终将《方志物产》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作为重点课题。得益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物产知识库构建及深度利用研究”立项的契机，南京农业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团队开始对《方志物产》文献进行深度整理。

3.1 制定方志辑录路线图

中国现存方志大概约有万余种，这部分方志散落于全国各地，从中再次系统性的摘录出物产资料就需要通盘考虑。掌握全国方志总目是再次辑录方志物产内容的总枢纽，诚如张之洞所言：“为学之道，宜得门径。泛滥无归，终生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19]”因此，需要对查抄志书的时限、区域、总目进行框定，制作整理路线图（整理路线图如图四所示），方能对现存地方志进行系统查找并对其中的物产内容进行辑录。



图四 《方志物产》文献目录整理路线图

这部分的工作具体来说：

一是框定方志出版时限并且按照现有行政区划进行划分。《方志物产》文献查抄志书来源为1949年以前旧志，因此在补充志书来源时将时间框定在1949年以前，与《方志物产》文献保持一致。在行政区域上划定上，为了更好的整理来源志书目录，按照现时的行政区划进行划分，将彼时的安徽（下同）划分为安徽和江西④，将四川划分为四川和重庆、将广东划分为香港、澳门、广东、海南，将江苏划分为江苏和上海，将河北划分为北京、天津和河北。

二是立足《方志物产》查抄来源志书目录，打破地域、单位、载体限制，对全国馆藏单位以及开源数据库展开系统摸排，全面查找整理地方志物产资料，做到全收全录。首先析出《方志物产》文献当中的来源方志目录，同时对于其中部分记载了内容但是没有目录的方志也要细加考校，以此作为基准，同《方志分类》和《方志综合》析出的目录以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进行比对，对重复记载的来源方志予以删除，将比对的不重复方

④ 婺源市曾于在1934年以前属于安徽省管辖范围，1949年正式划归江西省上饶市管辖。

志目录作为搜集线索留存，以此形成目录底本。其次对目前国内已经开源的爱如生“中国方志库”、籍古轩“中国数字方志库”数据库中的地方志目录资源进行搜集、整理，并于国内 275 个专业古籍数据库中的数据资源以及主流搜索引擎进行查找、分析和对比，进一步厘清方志完整目录。最后将整理出的方志目录按照行政区划划分完成之后，一方面同《中国古方志考》、《上海地方志考》等地方志考编已有成果进行考证，并向对应省份所在地的档案馆、地方志办公室、社会科学院以及国内大型图书馆、文物机构发函查询，对目录进行比对，以便确定有无。另一方面向在外⑤从事有关研究的同仁去函去电，请求其在所在国图书馆帮助找寻。

经过目录整理，比对增加了含物产记载的志书 1792 种，最终《方志物产》文献来源志书总数扩充到 7862 种，其中地方性志书 7840 种，全国性志书 22 种，经过补充之后的志书具体来源地区及数量如表 5 所示：

表 5 《方志物产》补遗后志书来源地区及数量

地区	数量	地区	数量	地区	数量	地区	数量
浙江	653	广东	413	广西	195	海南	55
河北	542	山西	385	辽宁	152	黑龙江	50
四川	534	湖南	341	贵州	121	台湾	45
山东	518	云南	335	重庆	112	内蒙	42
江西	462	安徽	330	上海	96	北京	41
河南	452	福建	297	西藏	78	青海	38
江苏	436	湖北	285	吉林	77	天津	26
陕西	432	甘肃	205	新疆	72	宁夏	20

3.2 版本比对，再现原档

《方志物产》文献查抄来源志书基本源于错误较少的善本，并且也理清了版本的源流。但是在查抄过程中仅仅是抄录了来源志书的年代及名称，并没有详细记录来源志书版本以及编纂信息，为后续确定版本的性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了弄清《方志物产》文献的版本源流，根据版本学的任务和方法⑥，本课题组主要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寻找并初定志书查抄来源版本。在最初的查抄工作中，查抄者们在誊抄过程中，查抄的内容主要有：志书名、年代以及物产等。在后续校对过程中发现，基本每一本查抄志书都会出现类似于“江蘇下：439”“18：1”这样的记载信息，这样的信息很是让人迷惑。随后在对朱自振先生的采访中得知，这样的记载信息恰恰是对来源志书版本的标记，大意为物产内容查抄于某本志书中的第几卷以及卷中第几页。根据这样的信息，开始对来源志书版本开展大规模的比对工作，以便确定版本信息。

⑤ 主要涉及的国家有新加坡、日本、英国及美国等。
⑥ 版本学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版本的性质、年代，版本的质量以及版本的源流。面对一本古代地方志，第一个任务是确定书名、卷数、编撰者、朝代，随后再确认为什么版本，是刻本还是抄本，亦或是石印本、油印本、活字本还是排印本，还要继续细分是稿本还是一般抄本。

无版本记载信息的志书，则需要广寻版本进行比对。这就需要将该志书的近似年代的所有版本搜寻出来，根据时代排序，并且审阅志书序跋内容，厘清该版本的精确信息。在此基础上以《方志物产》文献作为底本，分别去比对搜集到的所有版本来源志书的具体内容，除此之外，还需查看排版方式、记载体例甚至出现的错误是否一致，以此来确定版本信息。但需在校勘记中标明该版本为疑似版本。

补阙。在前文中已经交代，在查抄志书时，查抄者们并没有查抄来源志书的编纂者信息以及来源志书究竟是什么版本。因此补阙主要是补充编纂者信息以及补充版本信息。前者是指补充查抄来源志书的编纂者、修订者姓名；后者是指标记该本志书是抄本、刻本还是印本等。以此来限定来源志书的唯一版本。

在完成上述工作后，参照数字图书馆中常用的 Dublin Core 元数据著录规则，对《方志物产》文献查抄来源志书目录进行编著（如表 4 所示）。著录元素包括：名称（志书名）、日期（纂修日期）、主要责任者（地方志主修者以及责任方式，如纂、修、续修等）、主题（物产、物华、土产等）、来源（卷数、页码等）、描述（物产序言）、出版者、方志类型（通志、府志、县志等）、地区、版本、载体形态、馆藏信息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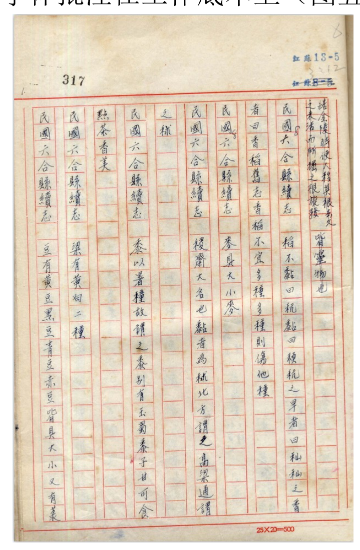
表 4 《方志物产》文献查抄来源志书目录与版本格式化处理样例

名称	酉阳州志	如皋县志
日期	乾隆五十四年（1879）	乾隆十五年（1750）
主要责任者	邵陆编纂	郑见龙编纂
主题	物产	食货志
来源	卷之一 页十九 A 面	卷十七 页一 B 面
描述	物产于地，土肥则物茂。益州素称沃野千里者也，独酉属处巴渝极偏。毗连黔、楚，万山环叠，无旷土平原，故其种止宜菽、黍。	叙曰：先王以农桑为本，教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天下饥且寒矣，故志食货。先五谷，重民命也；次麻枲，厚织纴也。若夫鸡、豚之宜，果、瓜之美，鱼、盐、蚌、蛤之产，以养老疾。奉宾祭、阜货财，亦弗阙焉。传云衣食饶足，奸邪不生。安乐无事，天下和平。岂独皋为然哉！
出版者	无	无
方志类型	州志	县志
地区	重庆 酉阳	江苏 如皋
版本	刻本	抄本
载体形态	纸质本	影印本
馆藏信息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

3.3 校勘内容，提供信史

经过再次整理的《方志物产》文献，在借鉴了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精心补阙、正误，以期能够为后续研究提供信史。在文本处理上按照查抄志书原貌详加考校：

一是内容补正。在对《方志物产》文献进行校对时采用计算机三分屏的形式，左侧为查抄来源志书影印本，中间为《方志物产》文献查抄本，右侧为《方志物产》文献数字化版本。将来源志书影印本作为校对底本，将《方志物产》文献数字化版本作为工作底本。遇到异处，将所有异文用红色字体批注在工作底本上（图五）。


317

皆靈物也
民國六合縣續志 稻不黏曰秔黏曰糯秔之早者曰秈秈之香
者曰香稻舊志香稻不宜多種多種則傷他種
民國六合縣續志 麥具大小麥
民國六合縣續志 稷穄大名也黏者為秫北方謂之高粱通謂
之秫
民國六合縣續志 黍以暑種故謂之黍別有玉蜀黍子甘可食
點茶香美
民國六合縣續志 粱有黃白二種
民國六合縣續志 豆有黃豆黑豆青豆赤豆皆具大小又有菉

25×20=500

图五　内容补正示例

二是文字校注。如前文所言，在《方志物产》手抄本以及数字化版本中，会出现部分讹字以及集外字，主要采用他校法和理校法进行修订。他校时，主要利用物产描述信息中的引书内容。如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醴陵县志》的数字化版本中，出现了“米酒，行药*{上執下力}”、“鳖甲，治血*{疒内段}”这样的记录，对比来源方志影印本，这两处文字也漫漶不清。但是该处记载的内容引自《本草纲目》，遂查阅《本草纲目》中的谷部和介部，得知原文应为“米酒，行药势”、“鳖甲，治血瘕”。理校时，主要是从字形和字义着手进行考校。如清道光九年（1829）《东阿县志》“菜瓜，可以作*(上艹下爼)”。该字从日常生活经验以及字义来看，菜瓜应该是能够做腌菜的，疑为“菹”。后继续通过比对爱如生数字方志库。基本可以确定原文应为“菜瓜，可以作菹”。

三是时间更订。在《方志物产》文献查抄时，对于方志编纂时间会存在误记，对中西纪年进行转化时，时间上也有所讹误。遇到这部分问题，需要对时间进行考订。如康熙四十九年（1710）《酆都县志》的时间在中西纪年转化时原本记成“1910 年”。光绪十一年（1885）《蜀景彙考》查抄时将其记作“光绪十九年”。这部分错误虽然不多，但是也需一一考订更正。

以上的考校基于原文，尊重文献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方志物产》文献整理薄弱、滞后与方兴未艾的物产研究之间的矛盾。借用符号学的原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著者著述的过程可以视作为“编码”，读者们的阅读过程可以看作是“解码”。文献流传的过程中出现的讹文、脱文、衍文、倒文、异文等现象，这样的现象可以视作是“乱码”。通过对“乱码”加以重视并改正，恢复文献的原貌，保证记载的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可以很好的避免错误“解码”。

4. 结语：《方志物产》文献整理的进路

随着全球数字化的到来，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助力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引擎。在新时代背景下，立足于《方志物产》史料的保护和利用，我们再试谈几点看法，尝试为《方志物产》史料的深度整理和利用探索出新的门径。

4.1 基于用户共创视角持续不断的进行物产文献收集

截至到目前，对《方志物产》文献的整理和补遗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仍然有大量的地方志珍本、善本甚至是孤本流落在海外⑦。除了官方收藏之外，还有一小部分方志散落于私人藏书家手中。此种情况为方志的搜集增添了非常大的难度。数字时代的到来为解决这类问题带来了机遇，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等人提出，数字技术使得生产与消费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20]。因此可以借助“用户共创”模式，改变《方志物产》文献的供给形成，以共享为核心，构建《方志物产》文献“云”使用平台，基于用户和服务之间的互动理念，将传统意义的用户角色转变为知识的提供者以及服务者由他们为《方志物产》文献中已有内容进行校订并对未有内容提供资源供给。如此不断的存佚兼收，才能对中国方志中的物产语料做到全面收录，方能对物产知识做出全面的总结。

4.2 加快推进《方志物产》文献内容智能化处理

《方志物产》史料中蕴含了大量且丰富的“人、时、地、物、事”等知识，可以基于《方志物产》文献的语言特点进行语义知识组织，设计一套能够对专有名词、农业术语、命名实体以及序列知识为核心的《方志物产》文献内容智能化处理方法。例如在识别物产“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方面，结合物产的元数据信息，利用计算语言技术（深度学习、文本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领域的原理和方法，实现物产名称的考辨以及物产描述信息的考订。同时以构建面向领域研究的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为导向，运用计算语言学文献学和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对《方志物产》文献存储、计算、挖掘、分析以及研究。

4.3 构建物产专题数据库，进行物产内容分类整理

《方志物产》文献已经实现了整体知识库的构建，但专题数据库的建设仍然薄弱。《方志物产》专题数据库是指单一物产数据库、分类物产数据库以及局部物产数据库。所谓单一物产数据库，是指以某一种物产来进行数据库构建，如稻、麦、马铃薯、玉米、辣椒等；分类物产数据库是指以某一类物产来进行数据库构建，如粮食作物（山粮、田粮、树粮等，其中又可继续细分）、经济作物、园艺作物以及药用物产等；局部物产数据库是

⑦ 在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收藏着明代地方志孤本累计超过四十余种，九百多卷，其中《天顺如皋志》作为江苏如皋县的首部县志仅存于英国伦敦博物馆。

指以某一区域的物产进行数据库构建，如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等。通过构建专业化、体系化的物产专题数据库，可以洞悉某地或者某个区域物产结构的地域特征地区间的物产交流、物产自身的引种与演变等。有助于物产与自然史、环境史、社会发展史、文化史的关系，探索出物产与人类文明和谐共生的关系，找到“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取之有度”的生存智慧。

4.3 促进物产研究从实验室走向博物馆、走向大众

借助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契机，基于共生理论视域的“文化内容—数字化技术”系统，根据文化数字化发展的“超空间”——实体空间的数字化升级、“超时间”——时间系统的数字化延伸、“超现实”——虚实相交的数字化沉浸、“大融合”——新旧产业的数字化探索等趋势[21]，利用数字化手段链接《方志物产》文献知识，形成可整理、可拓展、可关联、可展示的新史料和新史实，为公众、学界和政府提供数据化、工具化、平台化三位一体的知识服务。让《方志物产》文献在“移动化、社交化、数据驱动化、智能化”的互联网浪潮下得到弘扬和传续，推动中华农耕文明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高京斋.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中国地方志,2022(2):4-10+124.

2 陈野.建构文化传统:中国方志的深层功能[J].浙江学刊,2021,246(1):125-135.

3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26.

4 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711.

5 Spencer Stewart.向中国学习：施永高、中美农业交流及历史价值[J].中国农史,2019,38(06):29-39.

6 王俊强.万国鼎与古农书整理[J].江苏图书馆学报,1993(5):52-53.

7 吴兴帜."物的民族志"本土化书写——以傣族织锦手工艺品为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9(6):49-55.

8 路成文.中国古代咏物传统的早期确立[J].中国社会科学,2013(10):140-161+207-208.

9 钱克金.明清太湖流域植棉业的时空分布——基于环境"应对"之分析[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No.137(03):18-30.

10 余欣.敦煌的博物学世界[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1-13.

11 安大伟.知识书写与社会变迁：清代东北方志物产志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8(03):167-172.

12 王熹,张英聘,张德信.明代方志选编序跋凡例卷(套装上下册)[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 2016:582.

13 李泽.朱士嘉方志文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15.

14 何业恒,文焕然,谭耀匡.中国鹦鹉分布的变迁[J].兰州大学学报,1981(01):130-141.

15 王利华.生态史的事实发掘和事实判断[J].历史研究,2013(03):19-25.

16 左亮,白振田,包平.《方志物产》素材库集外字特征及整理研究[J].中国科技史杂志,2022,43(02):177-191.

17 刘石,李飞跃.大数据技术与传统文献学的现代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21(02):63-81+205-206.

18 李雪梅.试论古典文献学的现代意义[J].图书馆学研究,2011(13):5-8.

19 范希增.书目答问补正[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1.

20 Alvin Toffler. The Third Wave[J]. Bantam Books, 1981.

21 周凯.面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文化数字化共生产业体系研究[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No.255(23):67-73.

作者简介： 左　亮：负责文中数据的整理、具体实践过程以及全文的撰写及修改；

黄思慧：负责前期实践过程以及论文的修改；

白振田：负责文章数据处理；

包　平：负责文章整体建构和结构指导。

The Cumulative Earth Innovation Pavilion: Paths and Discovery in the Documentation of Produce in Local Chronicles

Zuo Liang, Huang Si-hui, Bai Zhen-tian,Bao Ping

(1.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 Library,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s a classical book in the canon, the document " Produce in Local Chronicles ", which was hand-copied in 1958, is a systematic compilation of the titles and related contents of the local records, and is of great natur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value. Due to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 time, there are inevitably many flaws in its completeness and accuracy, and it needs to be collated and proofread in order to form a credible history. [Methodology/Procedure] Using the Founder's Notebooks as an example, this project uses a number of methods in documentary collation, such as comparative proofreading, with the aid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further develop the collation of the Produce in Local Chronicles in three areas: catalogue, edition and content. [Results/Conclusions]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collation, a set of feasible solutions for the restor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Produce in Local Chronicles was explored and constructe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use.

Keywords Produce in Local Chronicles, Historical collation, Proofreading